学术专论

清代伊犁索伦营述要

吴元丰

[摘要] 清朝统一新疆后，为了加强西北防务和巩固统一，在天山北部地区设置驻防八旗，建立起完备的防务体系。伊犁索伦营作为新疆驻防八旗的组成部分，其构成是多元的，由鄂温克族、达斡尔族、锡伯族兵丁组成，在军政合一的八旗组织下，和睦相处，共同生活，担负着戍边屯垦的使命，对巩固新疆的统一，保持当地社会的稳定，加强西北边界的防务，以及发展当地农牧业生产，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本文依据满文档案，并参考相关汉文文献，就索伦营的设置背景、兵丁来源、建制沿革、生计维系、驻防任务五个方面作一论述。

[关键词] 驻防八旗 索伦营 伊犁 鄂温克族 达斡尔族 锡伯族

[中图分类号] K249.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2）–02–0058–011

清乾隆年间统一新疆天山南北后，在天山北部地区设置驻防八旗，先后设立察哈尔营、索伦营、厄鲁特营、锡伯营、惠远城满营、惠宁城满营、乌鲁木齐满营、巴里坤满营、古城满营、吐鲁番满营，建立起完备的防务体系。索伦营作为新疆驻防八旗的组成部分，与其他各营一样，是军政合一的组织，具有军事、行政和生产三项职能。有关伊犁索伦营的历史，曾有学者研究并发表过文章，[①] 但随着相关满文档案的编译公布和开放利用，发现目前已有研究成果还不够深入，有必要进一步探究。本文根据满文档案，并参考相关汉文文献，就索伦营的设置背景、兵丁来源、建制沿革、生计维系、驻防任务五个方面作一论述，以供同好。

一、伊犁索伦营设置背景

清初，在伊犁驻牧的准噶尔部控制天山南北，与清廷抗衡。经过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不懈努力，清廷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最终统一了新疆天山南北。因长年战争，天山北部的人口锐减，土地荒芜，生产废弃，防务空虚。在这种严峻形势下，为了巩固统一局面，加强西北边疆防务，清廷决定派兵驻守。起初，从出征的八旗和绿营官兵内，抽调派驻天山南北各重

[收稿日期] 2021–06–15
[作者简介] 吴元丰（1956— ），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北京 100031; ambawu@sohu.com

① 吴元丰:《索伦与达斡尔西迁新疆述论》，吴元丰:《满文档案与历史探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15 年，第 284–298 页；李俊梅、高颖:《清代伊犁驻防索伦营考》，《新疆职业大学学报》2002 年第 4 期；佟克力:《清代伊犁驻防索伦营始末》，《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 年第 1 期。

镇要地，其中派驻伊犁马兵 1 500 名、绿营兵 2 000 名，马兵负责驻防，绿营兵则负责屯田和筑城。这些派驻伊犁的官兵，并不携带家眷，不是永久性驻兵，按规定每三年换班一次，从内地各省调遣派驻，这既耗费时间，又糜费钱粮，决非长久之计。

清廷从新疆的长治久安考虑，决定选调携眷八旗官兵移驻，由换防兵改为永久性的驻防兵，而且对新疆实施军府制的治理政策，在伊犁设置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简称伊犁将军，统辖新疆天山南北军政事务。乾隆二十七年十月十六日，乾隆帝发布上谕，正式设立伊犁将军，并以明瑞为首任伊犁将军。[①] 同时，军机大臣傅恒等遵旨议奏："自伊犁至乌鲁木齐、巴里坤，凡寻常事务，仍照旧例，由各该地方大臣办理"；"若有兵丁调遣之事，则听将军调遣"；"自喀什噶尔、叶尔羌至哈密所有回城，亦照巴里坤等处之例，驻各城官兵，皆听将军调遣，凡寻常事务，皆照旧例办理"；"又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处，皆地处边陲，回子各城地方，若有应急事件，需要调遣伊犁兵丁，亦准各处办事大臣咨商将军，就近调用伊犁之兵"。[②] 遂奉旨准行，明确了伊犁将军的职责权限：既是新疆最高军事统帅，同时也是新疆最高行政长官，代表中央政权负责处理新疆的军政事务。

伊犁地处新疆天山北部的西端，与哈萨克、布鲁特等接壤，是通往中亚地区的交通要道。伊犁地理条件也极其优越，水草丰美，宜耕宜牧，曾经是准噶尔汗帐所在地。伊犁将军驻在伊犁河北岸的惠远城，该城也因此成为西北边陲的军事重镇，在当时是名副其实的"新疆都会"。伊犁地区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地位，居于全新疆之首，需要重兵驻守。为了解决伊犁地区所需驻防兵力，清廷对全国驻防八旗进行调整，甘肃凉州、庄浪驻防八旗满洲、蒙古官兵，全部携眷移驻伊犁；京口、杭州等处驻防八旗汉军全部改编入绿营，其腾出的名额，分别拨给张家口外八旗察哈尔和黑龙江布特哈索伦、达斡尔等，作为八旗兵携眷移驻伊犁。

这次移驻伊犁的八旗兵丁都是永久性驻扎兵丁，与以往的换防兵丁比较，不仅因携带家眷而人口众多，而且来自不同的地区和民族，移驻行程远近不一，生活习俗存在差异，需要办理的事项极其繁杂艰巨，需要全面统筹规划，分期分批有序合理推进。伊犁驻防八旗兵丁的移驻，从乾隆二十七年开始，止于乾隆三十六年，共用了 10 年时间，先后分批移驻的有张家口外察哈尔、黑龙江鄂温克和达斡尔、盛京（辽宁）锡伯，以及甘肃凉州和庄浪、陕西西安和直隶热河满洲、蒙古等兵丁。其中首批移驻的是察哈尔兵丁，其次是鄂温克和达斡尔兵丁，最末一批是西安的满洲和蒙古兵丁。从移驻兵丁的来源来看，伊犁驻防八旗的构成是多元的，有满洲、蒙古、鄂温克、达斡尔、锡伯等民族，而且蒙古族又分八旗蒙古、察哈尔、厄鲁特等，其中八旗满洲、蒙古、锡伯早已成为正规军人，八旗察哈尔，布特哈鄂温克、达斡尔则是移驻伊犁后才成为正规军人，而厄鲁特属新编入的八旗兵。

二、伊犁索伦营兵丁来源

索伦，在清代文献中有两种含义，广义上指黑龙江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民族，狭义上指黑龙江鄂温克族。早先，索伦居住在黑龙江中下游地方，后来逐渐南迁至嫩江流域。康熙初年，先设布特哈八旗，后改设布特哈总管衙门，专门管理嫩江流域的鄂温克、达斡尔、鄂伦春等民族。布特哈是满语音译，其意为打牲。布特哈总管衙门管辖下的成丁，称打牲丁，平常猎貂进贡，遇有战事也奉调出征。雍正十年（1732），为了加强呼伦贝尔防务，清廷抽调一部分布特哈鄂温克、达斡尔兵丁移驻，编设八旗，设置总管统领，至光绪年间改为副都统。这部分

① 《军机处满文上谕档》，乾隆二十七年十月十六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本文所引档案均藏该馆），档案号：31-2。

② 《军机处满文议复档》，乾隆二十七年十月二十日，档案号：2864-2。

鄂温克、达斡尔人丁的身份发生变化，由打牲丁变成八旗兵，驻卡巡边，守卫疆土，而留在布特哈的鄂温克和达斡尔等人丁，仍保持其打牲丁的身份，每年照例捕貂纳贡。

乾隆二十二年初，当平定准噶尔战争进入尾声时，有人提议派索伦兵丁移驻伊犁等处地方，乾隆帝没有采纳，并明确指出："至所议索伦兵丁前往新疆管辖厄鲁特事宜，毋论远道迁移，事属未便，且索伦素属骁勇，若与厄鲁特聚处，势必染其余习，将来渐不可用，甚属无益。"[①]然而，到乾隆二十三年初平定准噶尔战争结束时，由于经过两次战争，当地厄鲁特蒙古人口锐减，彻底消除了乾隆帝顾忌的统治隐患，所以他改变初衷，欲派索伦兵丁携眷移驻新疆，特降旨曰：

> 索伦兵效力军前，屡年未获休息，今贼众渐次剿灭，大功将竣，自可不日撤回。现议在乌噜木齐、鲁克察克等处屯田，令绿旗兵驻扎，虽娴于耕作，而镇守巡防之用不及索伦，若令索伦兵同驻，似为有益。伊等每年进纳貂皮，今移往驻防，既免其纳赋，又有钱粮养赡，射猎资生，自当更觉饶裕。可传谕绰勒多等，于索伦兵丁内，拣选一千名，明白晓示，以驻防之外，并无别项差遣，且于伊等生计有益。或今年先遣兵丁前往，来年再将伊等眷属移去，料伊等自必情愿。至拣选兵丁时，若户口多者，恐其亲属相离，毋庸派往，惟小户单丁为善。其作何选派及携眷驻防，果否与伊等有益，著绰勒多等定议具奏。[②]

在此道谕旨发出后的第二天，乾隆帝又补充降旨曰：

> 昨谕绰勒多等，拣选索伦兵一千名，驻防乌噜木齐等处，并将携眷前往之处议奏。特虑伊等两地瞻顾，务使得所之意。今思人情安土重迁，或携眷亦非所愿，且驻防兵丁，亦不妨更番戍守。著传谕绰勒多，体察情形，如不愿携眷，即定以年限，派兵更代，酌量赏赐。[③]

这道补发的谕旨说明，此次派遣索伦兵丁携眷移驻新疆并非指令性的，而是要看索伦兵丁的意愿，若不愿意携眷移驻，则作为换防兵派遣，限期更换。经黑龙江将军绰勒多询问获悉，索伦兵丁都不愿意携眷移驻，因而改成换防兵派驻。

索伦本为渔猎民族，善于骑射，骁勇强悍，编入八旗后，成为清朝军队中的劲旅之一。每遇战事，索伦兵都被抽调出征，而且表现勇敢，屡建奇功，久负盛名。伊犁地处西北边陲，且又作为新疆首府所在之地，务必要派驻八旗之劲旅，加强防务力量。乾隆二十八年年初在筹划伊犁驻兵事宜时，清统治者必然会想到英勇善战的索伦兵丁，所以"令黑龙江将军、察哈尔都统等，从索伦、察哈尔丁内选其情愿携眷迁往伊犁者，索伦一千名，察哈尔一千名，均作为披甲，照先前移驻察哈尔、厄鲁特之例，将内地应得钱粮及出差应得盐菜银均支给，连同凉州、庄浪三千二百名满洲、蒙古兵，共计兵丁五千二百名，俱携眷移驻伊犁"。[④]

乾隆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三日，黑龙江将军国多欢接到挑选布特哈兵丁携眷移驻伊犁的谕旨后，从鄂温克、达斡尔内各挑选兵丁 500 名，共计 1000 名，每 100 人内，拣选 2 人为头目管理，又选派布特哈总管 1 员、副总管 1 员、佐领 10 员、骁骑校 10 员管带前去。这些挑选的官兵分两队迁移，乾隆二十八年四月初十日，第一队的 500 名鄂温克兵，携带家眷 1421 口人，从嫩江流域起程西行，途经漠北蒙古车臣汗部、土谢图汗部地方，八月中旬抵达赛音诺颜部乌里雅苏台地方，经短暂休整补给后，八月底起程继续西行。在进入新疆后，伊犁将军明瑞派遣官兵携带米面至额敏河、博罗塔拉等处接济，于乾隆二十九年正月十九日，第一队鄂温克官兵顺利抵达伊犁。乾隆二十八年五月初三日，第二队的 500 名达斡尔兵，携带家眷 1417 口人，从嫩江流域起程西行，经过漠北蒙古车臣汗部、土谢图汗部地方，九月下旬抵达赛音诺颜部乌里雅苏台，

---

① 《清高宗实录》卷 530，乾隆二十二年正月庚子。

② 《清高宗实录》卷 558，乾隆二十三年三月己亥。

③ 《清高宗实录》卷 558，乾隆二十三年三月庚子。

④ 《大学士傅恒等遵旨议奏续派一千名察哈尔兵丁携眷移驻伊犁事宜折》，乾隆二十八年正月初六日，吴元丰、阿拉腾奥其尔等主编：《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全译》，新疆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28 页。

在其附近扎巴坎地方扎营过冬。二十九年三月中旬，经补给口粮和牲畜后起程继续西行，取道巴里坤、乌鲁木齐等地，于七月二十六日，第二队达斡尔官兵也顺利抵达伊犁。这 1000 名鄂温克、达斡尔兵丁到达后，经伊犁将军明瑞奏准，安置在惠远城西北霍尔果斯河东西两岸一带地方，合编为一营，称之为“索伦营”。

在鄂温克、达斡尔兵移驻伊犁后，由于诸多原因，不仅人口繁衍缓慢，而且男丁不断减少，至嘉庆二年（1797）已经没有壮丁补充兵缺，出现了严重的兵源危机。伊犁将军保宁发现，“伊犁索伦营人口增长向来不佳，竟有绝嗣之户，以往挑选披甲，已难得强壮闲散之丁。不料去年传染出痘，该营闲散丁亏损约四百名，现余闲散丁无多，亦俱年幼。是故，今挑选披甲，竟不得年力精壮者。”因此，伊犁将军保宁不得不向嘉庆帝提出建议称：“索伦营兵系一支劲旅，若不稍加调整办理，而以幼丁为兵充数，或致兵数减少，均不成事体。奴才留心细查，近数年来，锡伯营人口甚旺，现堪以披甲之闲散丁颇多。索伦、锡伯俱系东三省之人，风气相近，若锡伯营闲散丁移补索伦营，现即可得强壮之兵，而自幼与索伦合居一处，日久练习，自然俱成壮健之兵。”嘉庆帝采纳此建议批准施行，“于锡伯营十八岁以上、三十五岁以下强壮闲散丁内，选出即可挑甲者一百六十户，移至索伦营，按各该牛录闲散丁之多寡，分补挑甲”。[①] 后因道光初年间索伦营官兵数次奉调赴天山南部参加平叛战争，遭受一定的伤亡，道光十三年（1833）索伦营再度出现了兵源危机。索伦营领队大臣奇成额呈文伊犁将军特依顺保：“本部人口增长向来缓慢，而道光六年、十年派往喀什噶尔出征官兵内，阵亡官兵二百三十余员名。伊等所遗之缺，皆挑取身材较高之闲散、西丹，补充兵额当差。现有闲散、西丹，皆年幼尚未成丁。是故，堪以挑选八旗披甲缺之闲散、西丹，委实不能接续。请仍如前办，由锡伯部再选闲散、西丹一百名，携眷移至索伦部，以备拣选披甲。”[②] 遂经伊犁将军特依顺保奏准，由锡伯营拣选闲散丁 100 名，连同家眷一并移入索伦营，均匀分至各该牛录。先后两次共选锡伯闲散丁 260 户移入索伦营，从而彻底解决了兵源危机。伊犁索伦营兵由鄂温克、达斡尔、锡伯三个民族共同构成，这在清代伊犁驻防八旗各营中是极其罕见的，具有鲜明的特点。

三、伊犁索伦营建制沿革

八旗是清朝立国安邦的根本制度之一，分为京师八旗和驻防八旗。清入关后，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八旗驻防体系，选择全国各重镇要地派驻八旗兵丁，设置将军统率，至乾隆年间伊犁将军设置时，全国有 14 处驻防将军。从各处驻防将军的具体职掌来看，除盛京、吉林、黑龙江、伊犁 4 处将军外，其他 10 处将军都是纯军事驻防性质的，只管理本驻扎城池或地区的八旗事务，并不干预绿营兵和行政方面事务。而盛京、吉林、黑龙江和伊犁将军则不然，全权负责管理当地的军政事务，但因各地事务有所不同，彼此间仍存在一些差异。特别是在编制方面，比较而言唯有伊犁驻防八旗极为特殊，不像其他地方驻防八旗一样编设旗分佐领后，在将军之下设置副都统、协领、佐领、防御、骁骑校等员管带，而是以相对单一来源的兵丁为单元，按八旗出征兵之例，分别设置察哈尔、索伦、锡伯、厄鲁特、惠远城满洲和惠宁城满洲 6 个营。因惠远城满洲营与将军同在一城而不设领队大臣，只设协领、佐领、防御、骁骑校管理外，其余各营均设领队大臣、总管、副总管、佐领、防御、骁骑校管理，而各营领队大臣都与将军同驻一城，由总管和副总管负责处理各该营的日常事务。

---

① 《伊犁将军保宁奏索伦营闲散壮丁锐减请选调锡伯丁补充折》，嘉庆二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等编：《清宫珍藏达斡尔族满汉档案汇编》第 1 册，辽宁民族出版社，2018 年，第 465 页。

② 《伊犁将军特依顺保奏调锡伯丁补充索伦营兵额折》，道光十三年十月十八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锡伯族档案史料》上册，辽宁民族出版社，1989 年，第 615 页。

在鄂温克、达斡尔兵丁移驻伊犁之前，清廷已开始在伊犁河北岸修筑将军所驻城池，并派驻满洲和绿营换防兵，移驻一部分携眷察哈尔蒙古兵，收编留居伊犁的厄鲁特蒙古披甲当差。第一队鄂温克兵丁抵达后，就安置在伊犁河迤北霍尔果斯河迤西沙玛尔、齐齐罕、土尔根、撤橘等地；第二队达斡尔兵丁抵达后，就安置在霍尔果斯河迤东克阿里木图、霍尔果斯、富斯克等地。同时，所有 1000 名鄂温克、达斡尔兵丁，不按八旗之颜色，均匀编为 6 个牛录，其中鄂温克 3 个牛录、达斡尔 3 个牛录，分为左右两翼，统称索伦营，设置领队大臣 1 员、总管 1 员、副总管 1 员、佐领 6 员、骁骑校 6 员，负责管理营务。①

乾隆三十二年，由于伊犁索伦、锡伯、察哈尔、厄鲁特各营生齿日繁，官差增多，原有官员已不敷当差管理。于是，伊犁将军阿桂奏称："移驻伊犁之索伦、锡伯、察哈尔，按新厄鲁特之例，编设牛录，故不论旗分，曾以近二百户为一牛录，每部各设六牛录。今生齿日繁，一切差使等项而又烦冗，如仍旧责成六牛录官员管理，实属不足。再两翼厄鲁特中，右翼人众，且陆续来归之厄鲁特，较前亦多。将此只责成六牛录官员管束，则亦不足。明瑞朝觐时奏厄鲁特足够增添二牛录，奉旨准行。因而，除照办外，锡伯、索伦、察哈尔等三部，亦同厄鲁特部，请增添二牛录，俱整编为八牛录，以为八旗。""又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牛录，既已各为八旗，其旗纛颜色，亦应按旗授之。""原有左右翼（即厄鲁特——引者注）总管关防，锡伯、索伦、察哈尔总管关防及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佐领钤记（当作图记——引者）所铸字样，均已不合。应照现今整办之例，标明旗色，改铸颁发。"② 奉旨准行。此次整编未增加兵数，将原有的 1000 名兵丁，分编八旗，每旗各设 1 牛录，除原有总管 1 员、副总管 1 员、佐领 6 员、骁骑校 6 员外，增设佐领 2 员、骁骑校 2 员，并从披甲内选取领催 8 名，连同原有领催 24 名，共计 32 名，每牛录各为领催 4 名、披甲 121 名。在此基础上，颁发了新的总管关防和佐领图记，以及镶黄、正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八种颜色式样的旗。不久，因管理卡伦事务的需要，"于伊犁索伦、达斡尔内，视其效力奋勉、知晓卡伦事宜者，陆续拣选九名，给戴六品空蓝翎，轮驻卡伦"。③ 至此，伊犁索伦营的建制基本确立。

此后，索伦营建制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只是在保持原有 8 个牛录及每牛录各为一旗的前提下，进行了一些必要的变动。乾隆五十六年，添设养育兵 200 名、前锋 40 名，从前锋内选设前锋校 4 名。乾隆五十七年，每旗各设委官 2 员、空金顶 8 名。道光八年（1828）平定张格尔之乱后，办理善后事宜，为了进一步加强新疆地区的防务力量，经钦差大臣那彦成建议，由军机大臣长龄奏准，索伦营增添披甲 100 名，并于左右两翼各设防御 1 员，专管前锋。由此索伦营的建制更加完善，兵力进一步加强，并最终确立下来。营下分设八旗，每旗各设 1 牛录，设有领队大臣 1 员、总管 1 员、副总管 1 员、佐领 8 员、防御 2 员、骁骑校 8 员、委官 8 员、空金顶 8 员、空蓝翎 9 员、委笔帖式 2 员、前锋校 4 员、前锋 36 名、领催 32 名、披甲 1038 名。④

同治年间，伊犁地区发生动乱，俄国乘机入侵伊犁，割占霍尔果斯河迤西索伦营兵丁驻牧的地区，一部分索伦营兵丁被迫携眷迁到塔尔巴哈台。光绪八年（1882）清朝收复伊犁后，在塔尔巴哈台的索伦营兵丁有部分回到伊犁，被编入刚刚恢复的索伦营，留在塔尔巴哈台的索伦营兵丁则被编入当地的新满营。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灭亡，但索伦营制仍然保留，1938 年

---

① 《伊犁将军阿桂奏察哈尔等营添设牛录并颁发旗纛折》，乾隆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全译》，第 114 页。

② 《伊犁将军阿桂奏察哈尔等营添设牛录并颁发旗纛折》，乾隆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全译》，第 114 页。

③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舒赫德等奏，档案号：2481-030。

④ 《伊犁将军保宁等奏添设伊犁索伦达斡尔养育兵并挑取前锋支给钱粮折》，乾隆五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清宫珍藏达斡尔族满汉档案汇编》中册，第 1221 页；《伊犁将军德英阿等奏锡伯部添设防御前锋折》，道光八年八月二十二日，《锡伯族档案史料》上册，第 328 页；道光朝《钦定新疆识略》卷 5，第 13 页。

才被废除。今新疆伊犁霍城市和塔城地区的鄂温克族、达斡尔族、锡伯族就是清代伊犁索伦营兵丁的后裔。

四、伊犁索伦营生计维系

伊犁索伦营的鄂温克、达斡尔兵丁，原在黑龙江时，虽然编入布特哈八旗管理，但并非正规的八旗兵，属于“打牲丁”，日常从事贡貂差使。起初不领取钱粮，后来因其生计困难，特发给 2000 份钱粮，然每份都不是全额钱粮，而是半额钱粮。移驻伊犁后，他们的身份发生变化，成为永久性驻防八旗兵，承担守卫疆土的任务，因而由官方筹划安排其生计。

早在起程移驻时，黑龙江将军国多欢就遵旨向他们承诺：“现若移驻伊犁，则可获全额钱粮、盐菜银，又赏给立业牲畜及整装等项。”[①] 同时，又按照军机处奏定的办法，发给移驻所需的银两、牲畜和物品，保证顺利到达目的地。选派移驻的总管、委营总、佐领、骁骑校 22 员，按其职级各发一年俸银，共银 1 885 两；兵丁 1000 户，每户各给赏银 30 两，共银 30 000 两；兵丁每人各赏置办兵器银 10 两，共银 10 000 两；官员、兵丁及其家眷，共拨给马 2 998 匹，按每匹折价银 8 两计，共银 23 984 两；每户各给驼 1 只，应给驼 1000 只，按每只折价银 18 两计，共银 18 000 两；每户各给帐房 1 顶、锅 1 口，应给帐房 1 000 顶、锅 1000 口，按每顶帐房折价银 4 两、每口锅折价银 2 两计，共银 6 000 两；官员、兵丁及其跟役，按其级别和身份，共发盐菜银 93 229 两；所有家眷人口，按其大小，各发两个月口粮，共粮 1 352 石余。[②] 这样按其级别和人员身份发给的物资，不仅能够供给迁移途中的所需，而且有些物资到达目的地后仍可以继续使用，有利于其生计。

为了妥善安排索伦营兵丁的生活，经伊犁将军明瑞奏请，军机大臣傅恒遵旨议奏：“携眷移驻伊犁之二千名索伦、察哈尔兵初到伊犁，尚不习惯，若仅给钱粮而不给盐菜银，于其生计不利。伊等与去年移驻伊犁之八百名察哈尔兵相同，理合与伊等一体办理。自此二千名索伦、察哈尔兵抵达伊犁之日始，一年内支给盐菜银，期满一年后，即行停发，只给钱粮，并种地所需籽种，尽量赏给。收获前所需口粮，分别大小人口，大口每日为八合三勺，小口减半，期满一年后，一并停发口粮。”[③] 在鄂温克、达斡尔兵丁移驻之初，为防止其生活发生困难，采取了适当的优惠措施，除支给额定的饷银外，按照出征行军和当差外出之例，还发给盐菜银和口粮，而且口粮的发放包括所有人口。经过 25 年后，索伦营人口繁衍增加，原有俸饷银已不敷供养，需要酌情办理，以便维持其生计。乾隆五十六年，乾隆帝特降旨：“伊犁索伦、达斡尔营兵丁移驻以来，一切差使均极奋勉，且于喀什噶尔、塔尔巴哈台换防差务，皆甚得力。惟近几年生齿日繁，每月所食一两饷银，难免不敷供养。著加恩伊犁索伦、达斡尔兵丁，每月各赏食二两饷银，并添设养育兵三百名，每月给食饷银一两。”[④] 将军保宁接奉此旨后，立即据实奏请变通办理，遂允准除领催、披甲每月原食饷银 1 两外，各增加饷银 1 两，共计 2 两；所拨 300 份养育兵钱粮，添设养育兵 200 名，每月给食饷银 1 两，其余 100 名养育兵之额，添设前锋 40 名，每月给食饷银 2 两 5 钱。至此，每年应发俸饷银相对固定下来，即索伦营官兵估需俸饷银 26071 两，其中总管俸银 130 两、副总管俸银 105 两、佐领俸银 105 两、骁骑校俸银 60 两、轮驻卡伦空蓝翎盐

---

① 《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乾隆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九日，档案号：1763-1。

② 《黑龙江将军国多欢等奏报拨给携眷移驻伊犁索伦达斡尔官兵盐菜银口粮等项数目折》，乾隆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清宫珍藏达斡尔族满汉档案汇编》中册，第 962 页。

③ 《大学士傅恒等议奏明瑞等所奏筹办安置续迁察哈尔官兵事宜折》，乾隆二十八年三月二十日，《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全译》，第 43 页。

④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五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保宁奏，档案号：3337-015。

菜银 10 两、笔帖式盐菜银 36 两、领催钱粮银 36 两、前锋钱粮银 30 两、披甲钱粮银 24 两、养育兵钱粮银 12 两。①

特设滋生银收取利息，除供养鳏寡孤独者外，还借给官兵应急之用。在移驻之初，有官方支拨的一年盐菜银，并未全部发给兵丁，酌量扣留存库，以备应急之用。后来又作为本金贷给商人滋生，所获息银专门供养鳏寡孤独者。乾隆五十三年，伊犁将军保宁将所有 4000 两本银，饬交本地同知庄肇奎，每月每两收取息银 9 厘，赡养索伦营鳏寡孤独者。从乾隆五十六年增加兵丁饷银和添设养育兵后，索伦营兵丁生计逐渐得以改善，需要供养和接济者减少，每年收取的息银都有所剩余，至乾隆六十年已累积 9 000 两。保宁具奏："索伦营红白事及所有承应官差、派往换防等处官兵，于置办衣物等项整装时，惟因无接济之项，当遇到差使后，不免为难。是故，经与索伦营领队大臣霍硕额商议，由此一千九百两银内，计其足敷使用，永久留给该营九百两，酌定数额，凡遇此等事时借给，不收取利息，勒限一年，陆续坐扣其饷银填补原项，仍继续借给伊等。其余银一千两，亦饬交抚民同知，仍照前例交给商人滋生，每月每两收取息银九厘。俟此项息银又累积达一千两后，亦照此办理，仍令每年借支及坐扣银两年终详细禀报，由卑职饬交粮饷处核查。请将此作为定例，永久遵行。"② 奉旨允准，从而索伦营滋生银的管理和使用更加完善规范，确保鳏寡孤独者的供养和兵丁的应急借用。

索伦营官兵的俸饷银是额定而有限的，要想增加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难以按索伦营的实际需求随时增加，从未来人口发展和生活需求出发，必须要谋划长久之策。伊犁地区山川纵横，水草充足，适宜放牧，加之鄂温克人习惯于游牧兼渔猎的生活方式，而达斡尔人则习惯于农耕兼渔猎的生活方式，原计划一次性发给立业牲畜，牧放繁殖，补给生活。后因所需牲畜数量巨大无法解决，只好酌情变通办理，将官牧厂的孳生牲畜拨给牧放，按一定比例分配，以利于其生计。起初，鄂温克兵丁牧放的马 1 000 匹、牛 274 只、羊 12 975 只，达斡尔兵丁牧放的牛 276 只、羊 13 025 只。这些数目并非常数，历年都有所变化。按孳生牲畜管理办法规定，孳生马"三年一均齐，每三年本马三匹取孳一匹"；③ 孳生牛"四年一均齐，每四年本牛十只取孳八只"；④ 孳生羊"一年一均齐，每一年本羊十只取孳三只"。⑤ 乾隆三十一年三月，伊犁将军明瑞查看发现，"索伦等经常游牧，接近蒙古之生活习惯，仍可放牧。达斡尔等原先务农屯居，尚会牧放马牛，竟不会牧放羊只孳生"，⑥ 致使孳生羊倒毙。经奏准后，将达斡尔兵丁所剩 7232 只羊都交给索伦兵丁牧放。乾隆三十三年六月，新任伊犁将军阿桂又发现，索伦等"耕种私田，牧放孳生及私有牲畜，官差不少，其驻牧之地，又系贸易哈萨克来往大道所在，较其他营多需看护之人，且索伦等在原籍时，养羊者少，不甚会牧放孳生"。⑦ 遂经奏准，将其牧放的 10 632 只羊都移交厄鲁特营牧放。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索伦营领队大臣都尔嘉呈文将军曰："索伦等原牧放孳生马一千匹，陆续孳生马驹二百九十六匹，亦添给牧放孳生，又牧放私有牲畜，地方狭小，草场不佳，且去冬雪大，气候寒冷，牲畜倒毙甚众。本年应交孳生儿骒马驹数目不足，经各自尽力办理照数交纳。此项孳生马匹，若仍留给伊等牧放孳生，庶乎与其生计及官牧厂孳生均无益处。"⑧ 所以，又经伊犁将军舒赫德奏准，将索伦营牧放的 1296 匹马分别移交给察哈尔和厄鲁特营牧放。乾隆五十四年，因索伦营兵丁官差繁多，再无暇牧放仅剩下的 1600 余只牛，经将军保

① 道光《钦定新疆识略》卷 8，武英殿刻本，第 16 页。
②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六十年正月二十八日保宁奏，档案号：3493–022。
③ 道光《钦定新疆识略》卷 10，第 3 页。
④ 道光《钦定新疆识略》卷 10，第 4 页。
⑤ 道光《钦定新疆识略》卷 10，第 5 页。
⑥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三十一年三月初二日明瑞等奏，档案号：2181–054。
⑦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三十三年六月初四日阿桂等奏，档案号：2272–011。
⑧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二十日舒赫德等奏，档案号：2519–009。

宁奏准，全部抽出分交察哈尔营、厄鲁特营和屯田“回子”等牧放。索伦营兵丁虽然不牧放官牧厂孳生牲畜，但仍有私人牲畜牧放繁殖，成为其谋生的途径之一。

伊犁满洲二营既有饷银，又有口粮，而“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四营，除照例支给饷银外，所有口粮俱系自耕自食”。[①] 乾隆二十九年初，伊犁将军明瑞奏称：“索伦等移驻伊犁，其生计多半依靠种田及狩猎。今伊等抵达时，正值种田之际，令其妥善垦种，可及早得利，以便供给。故奴才等留有其承应官差、出行狩猎、牧放孳生官畜之时间，并计其耕作能力及足够食用，每户各拨给耕地八亩。又按其食用之喜好，由仓存粮石内，动支小麦五十石、青稞五十石、黍子一百五十石，作为籽种，按原先所奏赏给。”[②] 这就说明，第一队鄂温克兵抵达伊犁的第一年，就开始开垦种田。第二队达斡尔兵于七月底到达伊犁，已过播种季节，从第二年起，照第一队索伦兵之例开垦种田。按每户耕种 8 亩计，索伦营兵丁一年共种 8000 亩地。另外，还允许索伦营兵丁按其所能多种地。乾隆三十一年二月，锡伯营和索伦营领队大臣给将军呈文称：“今锡伯、索伦兵习耕此处地亩，若只种官给五百石籽种，尚未熟悉此处地亩情形，间或不能丰收，其食粮即致绝断。除官给额定籽种外，再尽力稍加多种，收成幸佳，其食不完者，于冬日饲养消瘦之马、卖而购置应补之畜皆有裨益。即使收成平常，因所耕有余，无论如何不碍食粮。请由官借给锡伯兵青稞四百石，索伦兵麦子、青稞、黍合五百石。所借之粮，俟秋收后，照从前回子等所借之例，每石利息一斗，本脚（当作本息——引者注）一并交纳。”[③] 遂经将军明瑞等奏准，“借给锡伯兵青稞四百石，索伦兵麦子三百石、青稞一百石、黍一百石”，并令各该领队大臣、总管等官员督促兵丁按时开垦播种，妥加管理，以期丰收。[④] 索伦营耕种所获的粮石都不交公，全部归本营支配食用。

索伦营兵丁平常乘闲狩猎补给生活外，在遭灾欠收时还打猎自救，而且得到官方的支持和鼓励。乾隆三十一年，因遭受蝗灾，粮食欠收，由官方组织打猎救济。时任伊犁将军明瑞奏称：“本年锡伯、索伦兵所种之田受蝗灾较重，若趁秋季兽肥，多派能手行猎，则于接济口粮稍有裨益。惟伊犁地方野兽之性，凡山兽多在大山深处险峻之地，戈壁之兽行于旷野。除撒大围捕杀外，少数人难以用弓箭捕杀，务由鸟枪手搜捕袭杀，方可有所收获。锡伯兵原先前来时，虽未带官枪，但所带私枪尚足以彼等行猎。索伦兵既无官枪，私带枪者亦寥寥无几。是以，现由在库旧存前由阿克苏、库车等处所送之枪内，借给索伦昂吉（即指营——引者注）一百枝。惟现在此处，火药一项颇难私得。若误过打猎之季，实为可惜。”所以，未经奏准立即通融办理，“由官存火药内，得（当作拨——引者注）给锡伯鸟枪手共五十斤，索伦等一百斤”。同时，奏请“一千名索伦兵既无枪支，可否将现在借给之枪一百支，即留给该昂吉之兵以备应急，平时持之行猎，以利于彼等行粮”。乾隆帝在明瑞的奏折上用满文朱笔批示：“sain。saha。”（此为转写——引者注）汉译“好。知道了”。[⑤] 这标志明瑞的奏请得到批准，从此索伦营兵丁就有鸟枪，除应急备用外，平时还可以持枪狩猎，保障打猎的收获和生计的补给。

五、伊犁索伦营驻防任务

设置伊犁驻防八旗的根本目的是加强本地区乃至整个新疆的防务，务必要布防合理，确保防务安全。伊犁地处西北边陲，“至于境外，自北而西则有哈萨克，自西而南则有布鲁特，壤

---

① 道光《钦定新疆识略》卷 8，第 3 页。
②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乾隆二十九年二月初九日明瑞奏，档案号：2073-036。
③ 《伊犁将军明瑞等奏锡伯官兵借种增垦地亩折》，乾隆三十一年二月十九日，《锡伯族档案史料》下册，第 605 页。
④ 《伊犁将军明瑞等奏锡伯官兵借种增垦地亩折》，乾隆三十一年二月十九日，《锡伯族档案史料》下册，第 605 页。
⑤ 《伊犁将军明瑞奏请狩猎济食折》，乾隆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锡伯族档案史料》下册，第 605 页。

界毗连”，[1] 驻防任务极为艰巨繁重。伊犁的驻防八旗，由惠远城满洲营、惠宁城满洲营、锡伯营、索伦营、察哈尔营、厄鲁特营组成，而惠远城满营和惠宁城满营处于核心地位。惠远城和惠宁城都修筑在伊犁河北岸，一西一东，相距 70 里，伊犁将军驻惠远城。以惠远城为中心，“东北则有察哈尔，西北则有索伦，西南则有锡伯，自西南至东南则有厄鲁特，四营环处，各有分地”。[2] 除锡伯营筑城而驻外，索伦营、察哈尔营、厄鲁特营都游牧而驻，但都有规定的防区和任务。

其一，驻守卡伦。卡伦是满语音译，其意为哨卡、哨所。卡伦之设，对外防范侵扰，对内查禁偷盗、稽查逃犯，看护屯所和牧场。卡伦有常设、移设、添撤之分，“历年不移而设有定地者，是谓常设之卡伦”；“住卡官兵有时在此处安设，有时移向彼处，或春秋两季递移，或春冬两季递移，或春夏秋三季递移者，是谓移设之卡伦”；“其地虽有卡伦，而有时安设，过时则撤者，是谓添撤之卡伦”。[3] 索伦营驻牧之地，毗连哈萨克游牧地界，设有常设卡伦和添撤卡伦，共有 10 座，没有移设卡伦。其中常设卡伦 6 座，分别为霍尔果斯，卡伦侍卫 1 员，索伦营官 1 员、兵 20 名，厄鲁特营兵 5 名，共驻 37 人；齐齐罕，卡伦侍卫 1 员，索伦营官 1 员、兵 15 名，厄鲁特营兵 5 名，共驻 22 人；奎屯，卡伦侍卫 1 员、索伦营官 1 员、兵 15 名，厄鲁特营兵 5 名，共驻 22 人；博罗呼济尔，卡伦侍卫 1 员，索伦营官 1 员、兵 20 名，厄鲁特营兵 10 名，夏秋添惠远城满营官 1 员、前锋 5 名，索伦营兵 10 名，共驻 48 人；崆郭罗鄂伦，卡伦侍卫 1 员，索伦营官 1 员、兵 25 名，厄鲁特营兵 10 名，共驻 37 人；辉发，卡伦侍卫 1 员，索伦营官 1 员、兵 20 名，厄鲁特营兵 5 名，共驻 27 人。添撤卡伦有 4 座，分别为旧霍尔果斯安达拉，春季添冬季撤，索伦营官 2 员、兵 30 名，共驻 32 人；齐齐罕安达拉，春季添冬季撤，索伦营官 2 员、兵 15 名，共驻 17 人；河岸，冬季添夏季撤，伊犁河结冰后，与南岸锡伯营所辖沙喇托罗海卡伦合走开齐，索伦营官 1 员、兵 20 名，共驻 21 人；奎屯色沁，冬季添夏季撤，索伦营官 1 员、兵 20 名，共驻 21 人。[4] 在以上 10 座卡伦中，索伦营独立驻守的卡伦 3 座，与惠远城满营合驻的卡伦 1 座，与厄鲁特营合驻的卡伦 6 座，与锡伯营卡伦“合走开齐”1 处，每年派驻卡伦官兵共计 274 人。按规定领队大臣每年春秋二季各巡查所属卡伦一次，每两座相邻的卡伦定期派兵巡逻会哨，称之为“开齐”，相互通报情况，若有情况，或当即处置，或逐级禀报。

其二，巡查哈萨克、布鲁特边界（指与清朝接壤的边界）。伊犁接壤的“哈萨克游牧，自西而北，过塔尔巴哈台，直接科布多交界”。[5] 每年秋季伊犁将军派遣领队大臣 1 员，率领各营所派官兵 300 名，其中索伦营官兵 50 余名，巡查哈萨克边界一次。从伊犁起程后，“于沿途有兽之处率官兵练习打猎，妥善指教一切出外之道，严加约束官兵，毋于哈萨克游牧内招致事端，巡查库库乌苏、哈拉塔勒等处，至勒布什后，会塔尔巴哈台所派征收官赋之官兵，各自分地照例征收官赋”，[6] 而后由原路返回，需要月余时间。在巡边过程中所征的“官赋”，是指允准进入卡伦内越冬哈萨克交纳的“租马”，或称“马税”“马租”。“布鲁特边界远在西南哈尔齐喇卡伦以外，越善塔斯太、毕勒哈图等山，行数百里，始见其游牧之人，至特穆尔图淖尔两岸，间有布鲁特所种田地。”[7] 每两年春季伊犁将军派遣领队大臣 1 员，率领各营所派官兵 300 名，其中索伦营官兵也有 50 余名，巡查布鲁特边界一次。从伊犁起程后，沿途一边巡查边界，一边狩猎演

① 道光《钦定新疆识略》卷 11，第 1 页。
② 道光《钦定新疆识略》卷 11，第 1 页。
③ 道光《钦定新疆识略》卷 11，第 2 页。
④ 道光《钦定新疆识略》卷 11，第 11 页。
⑤ 道光《钦定新疆识略》卷 7，第 3 页。
⑥《伊犁将军庆祥奏派出锡伯官兵等巡查哈萨克边界折》，道光三年七月二十二日，《锡伯族档案史料》，第 570 页。
⑦ 道光《钦定新疆识略》卷 7，第 3 页。

练，行至穆尔图淖尔后，由原路返回，需要近两个月时间。伊犁巡边官兵每当接近其游牧地界时，临近布鲁特部落首领率人前来迎见，进献“伯勒克马”，而后领队大臣设宴款待，酬赏绸缎等物。① 在双方会见结束后，布鲁特部落首领派专人陪同当向导，查看布鲁特人是否擅自越界放牧和开垦种田，若发现违禁者，则立即驱逐。

其三，塔尔巴哈台换防。塔尔巴哈台地处新疆天山北部，西南与伊犁接壤，是通往阿尔泰、科布多等地的要冲，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乾隆二十九年，在塔尔巴哈台地方修城，设参赞大臣 1 员，选派京城八旗和黑龙江索伦等官兵驻守。自乾隆三十一年开始，由伊犁满洲、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等营选派 1 300 名兵换防，其中满洲兵 550 名、锡伯兵 150 名、索伦兵 100 名、察哈尔兵 200 名、厄鲁特兵 300 名，酌派官员管带。在这些换防官兵内，满洲营、锡伯营官兵驻防二年，每年按新旧之班，于青草长出时更换一半，而索伦营、察哈尔营、厄鲁特营官兵驻防一年，期满一年后就全部换班。嘉庆十二年（1807），经伊犁将军松筠具奏调整后，各营派出的官兵数目如下：惠远城满营协领 1 员、佐领 2 员、防御 2 员、骁骑校 4 员、兵 415 名；惠宁城满营佐领 2 员、防御 1 员、骁骑校 3 员、兵 305 名，锡伯营佐领 1 员、骁骑校 1 员、兵 130 名，索伦营骁骑校 1 员、兵 130 名，察哈尔营佐领 1 员、骁骑校 1 员、兵 160 名，厄鲁特营佐领 1 员、骁骑校 1 员、兵 160 名。共计官 22 员、兵 1 300 名。② 此数并非一成不变，随着驻防形势的变化，还是有所调整的，但变化不大。各营赴塔尔巴哈台换防的官兵，按规定重新编制后，才起程前往。其派出的官兵，“每一百兵为一甲喇；满洲、锡伯兵每甲喇派佐领以下实职官二员；索伦、察哈尔昂吉每甲喇派实职官一员；左翼厄鲁特昂吉每甲喇派实职官二员；每一甲喇由实职官员内委任参领一员，俾其统兵；有一名实职官员之甲喇，由领催内委任骁骑校一员，协助带兵；由协领以下、佐领以上官员内派出二、三员委任营长，总统诸事”。③ 塔尔巴哈台的换防官兵，除驻守城池外，还分驻该地所设 29 座卡伦，巡查边境，以及承应其他临时性官差。

其四，喀什噶尔换防。喀什噶尔是新疆天山南部重镇，是中西交通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乾隆二十五年，设置参赞大臣 1 员，总理天山南部军政事务，并派西安、京城八旗官兵驻守。自乾隆三十六年始，改由伊犁满洲、锡伯、索伦、察哈尔等营选派官兵换防。喀什噶尔的换防官兵，两年换班一次，每年换防一半。各营换防官兵的数额，随着天山南部地区形势的变化，不时发生变化。起初曾有一段时间，停止选派索伦营和察哈尔营官兵，只选派满洲营和锡伯营官兵。至嘉庆年间，又开始选派索伦营官兵。此时各营派出的官兵数目如下：惠远城满营佐领 1 员、前锋校 2 员、委笔帖式 1 名、小旗 4 名、前锋 24 名、领催 4 名、兵 35 名，惠宁城满营防御 1 员、前锋校 1 员、小旗 1 名、前锋 8 名、领催 2 名、兵 18 名，锡伯营佐领 1 员、骁骑校 1 员、领催 4 名、兵 96 名，索伦营佐领 1 员、骁骑校 1 员、领催 4 名、兵 96 名。共计官 10 员、兵 296 名。④ 这些赴喀什噶尔换防的各营官兵，按规定重新编制后，才起程前往。其派出的官兵，“每一百兵为一甲喇；每满洲甲喇，由佐领、防御内委任参领一员统领，又派骁骑校一员协助；索伦、锡伯、察哈尔部派实职官一员，委任参领，俾其统兵，并由领催内拣选优良者一名，委任骁骑校，协助统兵；统兵所需营长，酌量兵数，于协领、总管以下、佐领以上官员内，拣选善于管束者一员，委任营长，总统诸事”。⑤ 喀什噶尔的换防官兵，除驻守城池外，还分驻该地所设 18 座卡伦，巡查边境，以及承应其他临时性官差。

索伦营官兵除承担驻守卡伦、巡查边界和换防城池等日常防务外，凡遇有战事都奉调出征，

---

① 《伊犁将军特依顺保奏派出锡伯等官兵巡查布鲁特边界折》，道光十七年六月二十一日，《锡伯族档案史料》，第 571 页。

② 道光《钦定新疆识略》卷 5，第 28 页。

③ 《大学士傅恒等议奏雅尔换防事宜折》，乾隆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锡伯族档案史料》，第 535 页。

④ 道光《钦定新疆识略》卷 5，第 30 页。

⑤ 《伊犁将军伊勒图奏喀什噶尔等城换防定例折》，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初三日，《锡伯族档案史料》，第 547 页。

与其他各营官兵一起，共同抵御外侵和平息内乱。道光六年，逃亡浩罕的大和卓次孙张格尔率兵侵占喀什噶尔、叶尔羌等 4 城，索伦营副总管哈丹保奉命率兵出征，建立赫赫战功，赏赐达哈逊巴图鲁名号，画像入紫光阁。道光十年，逃亡在浩罕的大和卓长孙玉素普入侵喀什噶尔等城，伊犁索伦、满洲、锡伯、察哈尔、厄鲁特各营共派官 30 员、兵 2000 名，远赴天山南部征战。同治四年（1865），浩罕军官阿古柏率兵入侵天山南部，伊犁索伦、满洲、锡伯、察哈尔、厄鲁特各营又共同派兵抵御。光绪二年，左宗棠督军收复新疆时，索伦、锡伯、察哈尔、厄鲁特等营军民积极响应，纷纷赴前线作战。

总之，伊犁索伦营的构成是多元的，由鄂温克族、达斡尔族、锡伯族兵丁共同组成，在军政合一的八旗组织下，和睦相处，共同生活，担负着戍边屯垦的使命，为巩固新疆的统一，保持当地社会的稳定，加强西北边界的防务力量，抵御外来入侵，以及发展当地农牧业生产，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References

Li Junmin & Gao Yin: “Qingdai yili zhufang suolun ying kao” (On the Solun battalion in Qing Ili). *Xinjiang zhiye daxue xuebao* (Journal of Xinjiang Vocational University) 4 (2002).

Tong Keli. “Qingdai yili zhufang suolun ying shimo” (On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the suolun battalion garrisoned at Ili in the Qing dynasty). *Xinjiang daxue xuebao (zhexue· renwen shehui kexue ban)* [Journal of Xinjia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Social Science)]1 (2006).

Wu Yuanfeng. “Suolun yu dawoer xiqian xinjiang shulun” (On Suolun and Daur’s westward migration to Xinjiang). In Wu Yuanfeng. *Manwen dang’an yu lishi yanjiu* (Manchu Archives and Historical Studies). Shenyang: Liaoning renmin chubanshe, 2015.

Review of the Solun Battalion of Ili in the Qing Dynasty

WU Yuanfeng (The Fist Historical Archives of China; ambawu@sohu.com)

Abstract: After the Qing Dynasty integrated Xinjiang into the empire, the eight banners garrison was set up in the northern Tianshan Mountain and an adequate military system was established to strengthen the defense of Northwest China and to consolidate the unification of the territory. As one component of the garrison of eight banners in Xinjiang, the composition of the Ili Solun Battalion was diverse and it included the soldiers of Daur, Ewenki and Sibo. Under combined military and political administration of the eight banners system, the soldiers lived together and got along with each other. Border garrison and wasteland reclamation were their missions. The Solun Battalion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consolidating the unity of Xinjiang, maintaining local social stability, strengthening the defense of Northwest border and developing agriculture and animal husbandry. Based on Manchu archives and relevant Chinese documents, this article address five issues, including the context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olun Battalion, the source of the soldiers, the organizational system and history, the livelihood of the troops, and the mission of the garrison.

Keywords: the garrison of eight banners, Solun battalion, Ili, Ewenki, Daur, Sibo

学术专论

清朝对土尔扈特等部东归消息的获得与应对

赵　毅

［摘要］ 清朝是在事先毫不知情的情况下，从俄罗斯官方得知清朝平定准噶尔时投向俄罗斯的厄鲁特人脱逃之事，且可能前往旧卫拉特游牧地，尔后又得知其中有叛逃清朝之舍楞等人。这一突发情况引发了清朝内部是否收纳的争论，清朝如何决策应对，则来源于对土尔扈特等部是否东归及东归意图的判断，而此问题又需要通过各种消息来解决。本文从清朝对东归消息的获得渠道出发，分析其如何对各种消息进行辨别并适时给出合理的应对策略，指出乾隆帝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还考察了留居额济勒河之人再次东归传言的始末。

[关键词] 土尔扈特等部　东归　消息　途径　应对
[中图分类号] K249.3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587（2022）－02－0069－011

土尔扈特等部的东归是 18 世纪亚欧大陆一次部落大迁徙事件，对清朝来说是最后一个蒙古部落的归顺，“自斯凡属蒙古之族，无不为我大清国之臣”。① 对俄罗斯而言则是失去了为其对外征战的重要臂膀。② 然而清朝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获得东归消息，俄罗斯方面声称脱逃者为清朝平定准噶尔时投归俄方之人。清朝陆续获得的各种消息中亦曾透露他们前来目的不纯，由此不免对其东归的目的产生猜疑。如何理性地分辨各种信息，做出合理的应对策略，不仅考验着统治者的智慧和勇气，而且极大地影响了清朝接纳与安置政策的制定。现今的相关研究中皆曾提到清朝在获得消息后的应对事宜，③ 特别是郭文忠讨论了哈萨克阿布赉的“密报”如何影响了清朝的接纳安置方案，④ 但是还缺乏专门对清朝获得东归消息的途径及应对策略的整体阐释。而

［收稿日期］ 2021-05-30
［作者简介］ 赵毅（1988—　），男，新疆大学历史学院（历代西北边疆治理研究中心）讲师，乌鲁木齐 830046；byzy2008@126.com

① 《御制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清高宗实录》卷 892，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乙巳。
② 渥巴锡东归后曾报告俄罗斯多次征调他们与孔喀尔作战。《钦差大臣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奏土尔扈特谱系及来归原因和户口数目折》，乾隆三十六年八月初三日，吴元丰、乌·叶尔达、巴·巴图巴雅尔主编：《清代东归和布克赛尔土尔扈特满文档案全译》，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39 页。
③ 相关代表性成果有马大正：《清政府对蒙古族土尔扈特部的安置》，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史研究集》第 2 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 年，第 246-252 页；汪玉明：《从土尔扈特部的归来看各民族的关系》，翁独健主编：《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年，第 301-311 页；葛玉岗：《乾隆帝与土尔扈特蒙古重返祖国》，《安徽史学》1985 年第 6 期；毛必扬：《略述土尔扈特部回归》，《历史档案》1986 年第 1 期。
④ 郭文忠：《土尔扈特东归中哈萨克形象再研究——以阿布赉汗为中心》，《清史研究》2018 年第 2 期。

从清朝接到东归消息到土尔扈特等部头批部众抵达察林河畔，其间不过两月有余，在哈萨克探听消息纳旺等人的奏报到达清廷时，土尔扈特等部已经归来，所以弄清在此之前清廷如何对各种消息进行辨别而合理地给出决策尤为重要。本文依托满文档案，围绕这个议题来展开讨论，以期有助于清代边疆民族史的研究。

一、初得东归消息的应急策略

清朝最初得知土尔扈特等部东归的消息来源于俄罗斯官方。乾隆三十六年（1771）二月，科布多参赞大臣书景阿接到昌吉斯台卡伦护送前来的俄罗斯使臣，经询得知他们为俄罗斯叶卡捷琳娜女皇递送文书之人，而所携文书大意为："先前准噶尔之杜尔伯特、卫拉特游牧动乱时，厄鲁特等陆续归附我俄罗斯，皆曾安置于我属游牧地方。去年十二月，此等厄鲁特由我处叛逃。将此情呈文知照天朝皇帝之卡伦诺彦等，请晓谕各该所辖卡伦人员留意，希双方皆仰赖皇帝洪福永久平安度日。"① 此处"去年十二月"，应经参赞大臣书景阿转换过的清朝历法，当为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而渥巴锡东归后报告起程的具体时间为"十二月初二日"，即公历 1771 年 1 月 17 日。② 此文书意在表明，清朝平定准噶尔时归附俄罗斯的厄鲁特人逃走，提醒清朝加以防范，特别强调这批人为俄罗斯属众，为两国友好相处考虑，倘若清朝加以接收，亦当归还。

关于这批出逃人众的情形，据俄罗斯使臣告称："我俄罗斯有人虽称有四万人，然不知其实数。其首领之名，亦不知晓。其中有鄂木布、果勒昭海属下人及旧土尔扈特一族人众。伊等背叛我等，抢掠我鄂罗木布尔塔齐、俄罗斯之间所设六七人驻守之两处驿站后叛逃，视其情形，或许前去寻找其旧杜尔伯特卫拉特游牧。"③ 据此可知，这批人大约有四万人，主要为鄂木布、果勒昭海属众，以及旧土尔扈特部人，抢劫俄罗斯两处驿站而逃，可能前往杜尔伯特游牧处。署定边左副将军车布登札布认为其中有曾经叛逃清朝的鄂木布、果勒昭海等人，且人数众多、目的不明，不得不加以防范，因此在奏报的同时先行部署了各种应对措施。其一，因为边卡侍卫在辉迈拉虎卡伦地方遇见俄使，此地靠近塔尔巴哈台，故行文该处参赞大臣知悉，并拓展卡伦加强巡逻，探听具体消息；其二，考虑到鄂木布、果勒昭海等旧为乌梁海人，推测他们可能会返回原处，故派人前往宰桑扎尔纳克、巴桑等处探听，倘若该处宰桑不知情形，则利用每年与俄罗斯所属乌梁海往来之便派人前往打探；其三，由于哈萨克投出之厄鲁特皆在伊犁地方安置，故该等人极有可能投回伊犁地方，因而咨文伊犁将军伊勒图加以防范。④

由上可知，土尔扈特等部可能东返的消息，仅是俄罗斯使臣的口头之言，俄罗斯方面还特意强调这些人为清朝平定准噶尔时归附俄罗斯的厄鲁特，主要头目有鄂木布、果勒昭海等。据后来查证可知此二人属众甚少，可以说这是俄罗斯故意提及曾背叛清朝之人，有意隐瞒土尔扈特部渥巴锡等人的情况，企图诱导清朝派兵堵截东归部众。对此，乾隆帝接到车布登札布的奏报后认为，这些人因在俄罗斯不能安居而逃，特下谕给西北边界各处将军大臣等："今观伊等窜回，乃是此辈在彼未得安居，故又掠其台站而返回。伊等若靠近边界，允许入界，并抚慰安置之。倘未至我边界，而中途被俄罗斯追逐冲突，则可不睬。若伊等诚心请求归顺，而俄罗斯又

① 《署定边左副将军车布登札布等奏俄罗斯派使索还欲返回旧游牧土尔扈特部众等情折》，乾隆三十六年三月十一日，《清代东归和布克赛尔土尔扈特满文档案全译》，第 1 页。

② 《钦差大臣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奏土尔扈特谱系及来归原因和户口数目折》，乾隆三十六年八月初三日，《清代东归和布克赛尔土尔扈特满文档案全译》，第 39 页。

③ 《署定边左副将军车布登札布等奏俄罗斯派使索还欲返回旧游牧土尔扈特部众等情折》，乾隆三十六年三月十一日，《清代东归和布克赛尔土尔扈特满文档案全译》，第 2 页。

④ 《署定边左副将军车布登札布等奏俄罗斯派使索还欲返回旧游牧土尔扈特部众等情折》，乾隆三十六年三月十一日，《清代东归和布克赛尔土尔扈特满文档案全译》，第 2 页。

请求索取，则我以理抗议俄罗斯。”[①] 此为乾隆帝在并未获知这批人众具体情况下，针对三种不同情形而给出的应对之策，透露出面对这一突发情况，清朝的基本态度为：归顺则纳之，否则无须理会。

实际上，清朝需要考虑的是第三种情况，即诚心归顺则如何接纳的问题。俄罗斯强调出逃之人是其属民，必然会涉及归属交涉之事，念及此，军机大臣寄谕边臣应对俄罗斯索取之旨：

> 厄鲁特、乌梁海，原系准噶尔属众，我大兵平定准部时，伊等背叛出逃，彼时俄罗斯则不该收纳。今伊犁等处业已平定，其地仍归我之版图，此厄鲁特、乌梁海等，亦为我之臣仆。前次伊等脱出，俄罗斯理应遣还，而反接纳安置，实属不近情理。如若伊等已被妥善安置，伊等何理反汝耶？现伊等已向我圣主乞恩归顺，再无送还之理。先曾再三咨文索取我逃犯舍楞、劳章札布等，然俄罗斯并未按原定之条约，将其遣送我大国。今反向我讨人，即使一、二名兵丁，亦不送还。此情此理，我圣主已再三降谕边臣，边臣既已接纳，断无送还之理。[②]

该谕旨的核心意思是，俄罗斯曾收留叛逃清朝之准噶尔人，清朝虽多次索取逃犯舍楞、[③] 劳章札布等人，而俄罗斯并未按两国“不能收留逃人之约”送还，故这批出逃之人若归附清朝，予以收留亦合情合理，即指出是俄罗斯违约在前，不是清朝不遵守约定。此反驳之文是乾隆帝深思熟虑而定，据后来清朝与俄罗斯就东归之人归属交涉情形可知，其成为反驳俄罗斯的核心内容。[④] 同时，乾隆帝又指出若舍楞、劳章札布、鄂木布、果勒昭海等一同归来，则派大臣率领前往热河觐见，其部众属下招抚安置。在随后谕旨中曾载：“前朕曾降旨：若舍楞、劳章札布等前来，则酌情安置伊等属众，将伊等招抚诱来。”[⑤] 要言之，清朝此时对这些人前来的动机还是持怀疑态度的，因而拟定对这些人实施招诱之策。

清朝内部对于是否收纳前来之人处在争论之中，特别是伊犁参赞大臣巴图济尔噶勒奏报脱出之人中可能有舍楞之后，这种争议更加强烈。“议者或以舍楞前此负罪逃去，不宜与众同受其降。”但乾隆帝却认为：“彼既弃俄罗斯而来，若拒而弗纳，彼退无所归，必为盗抄掠，非所以宁我边圉，且恐舍楞不来，同行之众或疑畏不敢前，殊非善全之计。若俟其既至，执之罪之，尤非所以昭威信示怀柔也。彼既悔罪输忱，则宥其已往，益足彰我宽仁，而卫拉全部莫非王臣，亦从来未有之事，又何必过为顾虑哉。”[⑥] 乾隆帝力排众议，提出归顺则予以收纳。此在给署定边左副将军车布登札布谕旨内曾载：“从前尔等逃奔俄罗斯之故，尚欲索取治罪，今因尔等不得安居于俄罗斯，既然亲自乞归，故概不究前逃之罪，不但不治罪，尚且施恩，将尔等同杜尔伯特一样，指给良牧，尔之人群由尔管辖、安居。”[⑦] 这是针对舍楞来归而给出的应对之策，因其自愿归顺而赦免之前的罪责，清朝将这种归顺行动作为“天朝大国”对外藩吸引力的一种展现，此情自然是清朝皇帝所乐见的。不再追究舍楞杀害清朝大臣的叛逃之罪，反而施恩依照安置科布多杜尔伯特之例办理，令他们自行管辖所属人众，以此来消除他们的疑惧之心。但这种恩遇的

---

① 《谕车布登札布等对土部来归之处置》，乾隆三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史研究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满文部合编：《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民族出版社，1988 年，第 1 页。

② 《谕车布登札布等对土部来归之处置》，乾隆三十六年三月二十二日，《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第 1–2 页。

③ 舍楞原为旧土尔扈特部卫衮察布察齐后裔，起初并未跟随土尔扈特部西迁，后参与阿睦尔撒纳的反叛，用计诱杀清朝副都统唐喀禄而被剿捕，最终逃往俄罗斯，清朝曾多次向俄罗斯索取，但其并未归还（《御制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清高宗实录》卷 892，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乙巳）。

④ 《大清国理藩院致俄罗斯国枢密院函》，1771 年，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历史研究》编辑部合编：《故宫俄文史料》，《清史译文新编》第 1 辑，2005 年，第 138–139 页。

⑤ 《谕车布登札布等对舍楞等人自愿归来应特加恩赐》，乾隆三十六年四月十一日，《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第 3 页。

⑥ 《御制伊犁将军奏土尔扈特汗渥巴锡率全部归顺诗以志事》，钟兴麒等校注：《西域图志校注》，新疆人民出版社，2002 年，第 496–497 页。

⑦ 《谕车布登札布等对舍楞等人自愿归来应特加恩赐》，乾隆三十六年四月十一日，《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第 3–4 页。

前提是诚心归顺，若是有可疑之处，则立即剿捕。

伊犁将军伊勒图对收纳之事亦持不支持态度，认为这些人行走数月仍没有消息，若是投向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处，约需三个月路程，而俄罗斯使臣相告皆为口头之言，并未见到文书原文，故怀疑此事是否为真。此时还未接到乾隆帝的指示，请旨询问是否接纳，认为清朝与俄罗斯已经订立友好条约，不便收纳脱逃之人，但是现已逃出，为了防止在哈萨克地方滋事不得不接纳。同时提出了安置之策：其一，若是人数过多则不能与伊犁厄鲁特合并安置，伊犁没有地方可以容纳，且伊犁靠近边界不便安置，若是人数过少则可以安置伊犁；其二，可以在遣送头目朝觐时，将他们留京安置，部众安置于察哈尔或内扎萨克等地。① 可见伊勒图的方案，实则避开伊犁安置，以减少麻烦，并声称在未接到圣旨之前，若他们前来归顺，则令该等留居卡伦之外，俄罗斯若前来索要，则不可安置，亦不加干预，实际上表达不可接纳的态度。当然，其出发点更多是为伊犁边境安全考量。

而乾隆帝接到此奏后，认为伊勒图不能办成此事，下旨将乌什参赞大臣舒赫德授为钦差大臣前去替换办事，并下谕予以驳斥，重申之前所降谕旨，又重新指示安置方案：东归人众可以归并到伊犁厄鲁特等处，若系乌梁海人则送回原处安置，舍楞、劳章札布、鄂木布、果勒昭海等人安置于额尔齐斯等处，罗布桑希努之子则仿照科布多杜尔伯特之例暂行安置。② 可见此方案与将军伊勒图所奏方案几乎相反，这也成为后面安置东归部众的指导方案。不难看出，此为伊勒图未能揣摩明白圣意所致，乾隆帝曾称此事“不仅关乎我大国之声誉，外藩人等闻之，亦加鄙视也”。③“今土尔扈特部众弃牧携眷，远涉前来者，特为承蒙大皇帝恩泽之意。”④ 清朝对诚心归顺之外藩加以接纳，这是“天朝大国”的责任，亦是国力强盛的一种体现。

由上可知，清朝从俄罗斯官方得知清朝平定准噶尔时归附俄方的厄鲁特人脱逃之事，俄方特别强调头目为曾叛逃清朝的鄂木布、果勒昭海等人，可能前往旧卫拉特杜尔伯特处。此举无疑是意指这些人不可深信，加深清朝的猜忌，而使清朝不会接纳他们，甚至诱导对他们进行截堵。此时，清朝自俄罗斯方面获知东归的消息，所以对于东归部众的具体情形不明，导致内部对于是否接纳之事争论不休，特别是得知其中有曾经杀害清朝大臣而叛逃的舍楞后，部分大臣直接表明反对接纳，最终乾隆帝力排众议，从大国角度考虑，对于归顺之人皆应予以接纳，并针对不同情况给出了应对之策，其成为西北边吏处理此突发事件的指导方针。

二、东归消息的核实与应对

清朝从俄罗斯方面得知东归人众的消息，对于他们是否东来还处于猜测阶段，而他们前来的动机更是清朝所关心的，此问题的解决需要通过各种消息来判断，以便适时地做出应对策略。

随后，据派往俄罗斯所属乌梁海贸易之人返回报告，该处宰桑纳木齐告称，罗布桑希努（即罗布藏舒努）之子鄂木布、果勒昭海等人，随同俄罗斯出征孔喀尔获胜，在俄罗斯赏赐时提出“与其赏赐我等，不如抚爱我等，允准返回我等旧游牧”，⑤ 此请求得到俄罗斯女皇的批准。可

---

① 《伊犁将军伊勒图奏报打探从俄罗斯来投土尔扈特情形及如何酌情安置事宜折》，乾隆三十六年四月初九日，《清代东归和布克赛尔土尔扈特满文档案全译》，第 3–4 页。

② 《伊犁将军伊勒图奏遵旨办理土尔扈特台吉等赴热河觐见事宜并酌情安置其部众折》，乾隆三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清代东归和布克赛尔土尔扈特满文档案全译》，第 6–7 页。

③ 《伊犁将军伊勒图奏遵旨办理土尔扈特台吉等赴热河觐见事宜并酌情安置其部众折》，乾隆三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清代东归和布克赛尔土尔扈特满文档案全译》，第 7 页。

④ 《谕伊勒图等若土部来归属实需妥善安抚》，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初八日，《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第 14 页。

⑤ 《署定边左副将军车布登札布等奏派人赴阿勒坦诺尔乌梁海等处打探土尔扈特返回消息折》，乾隆三十六年四月十三日，《清代东归和布克赛尔土尔扈特满文档案全译》，第 5 页。

见清朝派人所探听的消息与之前俄罗斯使者所告是相悖的，实则是一种误导信息。署定边左副将军车布登札布分析称："此等言语，乃俄罗斯散布之谎言，恐呼图克纳木齐等投奔俄罗斯人听闻彼等遁逃亦皆逃逸。……彼等或被敌人孔喀尔所败而溃奔，因畏惧俄罗斯，行经其游牧携带妻孥，来觅准噶尔旧游牧，欲归附圣主以期安逸，未可逆料。"① 即认为这是俄罗斯方面散布的谎言，以此来防止更多属众乘机脱逃，推测他们因畏惧俄罗斯惩罚而来归，这种判断亦得到乾隆帝的肯定。虽然没有探听到有效的消息，但是为了防止鄂木布、果勒昭海等人返回旧有游牧处而隐居僻处，专门委员抽调兵丁在境内汗、哈屯等处搜寻打探。

乾隆三十六年五月，将军伊勒图奏称："自哈萨克商贾处得悉，土尔扈特厄鲁特，因畏惧随从俄罗斯征讨控噶尔（孔喀尔），故此逃出。恰遇哈尔浑鄂托克之地哈萨克，便沿额尔齐斯河上游，前往伊辛之克孜尔、雅尔地方奔去。"② 从哈萨克商人传递的消息表明，这批人众脱出俄罗斯是实，且向他们西迁之前的旧有游牧处行进。为此，乾隆帝专门指示："伊等既然如此乞来，办理此事，并非有难，尚不需怀疑伊等矣。只从内部小心提防办理。倘若泄露防备伊等之意，则使伊等更加疑惧，于事不利也。"③ 并给钦差大臣舒赫德下谕，若该众来归则予以安抚。此时，清朝对东归之人的具体情况还并不清楚，皆为间接打探到的消息，所以这种无须怀疑也是有前提的，即诸台吉头目亲自前往朝觐，将是否敢于朝觐作为他们是否真心归诚的试金石。

不久，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安泰接到来自哈萨克使者的递文，据伊犁将军伊勒图等奏报：

> 阿布赉、阿布勒必（比）斯等派遣哈萨克肯泽哈喇、布鲁特等来告称，土尔扈特部众自俄罗斯脱逃，杀死我部众，抢掠马二三千匹、羊数万只，阿布赉与土尔扈特交战，歼擒四百余人。询据告得，其为首者，有土尔扈特汗渥巴锡、索诺、舍楞三位头人，男女共八九万户。等语。先曾往此而来，后又返回沿巴尔喀什湖西北行进，往沙尔伯勒而去。④

哈萨克使者传递相对确切的消息，使清朝进一步确认东归属实，为首者有土尔扈特汗王渥巴锡、索诺（疑为策伯克多尔济）、舍楞等人，属众八九万户，哈萨克阿布赉曾与之交战，因受到哈萨克的阻截，而转向沙尔伯勒方向前去，可能前往伊犁地方。

哈萨克使者除了传递消息外，亦表达了阿布赉请求清朝出兵攻打的建议，且称"土尔扈特大众无数，此来未知意欲何为，如用哈萨克帮兵劫掠，情愿效力"。⑤ 对此，伊犁将军伊勒图等认为东归之人与清朝并无矛盾，且雍正年间曾派遣使节前来，今因不堪忍受俄罗斯而来，不应攻打他们。不过，哈萨克阿布赉、阿布勒比斯等领兵堵截的行为却得到清朝的赞许，称此举与清朝派纳旺等人前去哈萨克的目的不谋而合。伊勒图等又称："兹据尔等告称，厄鲁特绕巴尔喀什湖往沙尔伯勒方向而来。由此观之，又有可能途经尔等游牧。厄鲁特业已骚扰尔等游牧矣，尔等岂能坐观其他游牧再遭迫害乎。卓尔齐既已备兵，相应尔等仍速返回，卓尔齐立即率兵，或前去堵截，或尾随追逐，则有利于尔等游牧哈萨克。"⑥ 即准许哈萨克等对他们的大肆抢掠。伊勒图曾解释如此处理的缘由："今土尔扈特来自异域，素知伊犁多兵戍守，断不敢稍萌异志，况其内或有从前惧罪逃往之徒，心存疑二，故使哈萨克前来探听消息，亦未可知，若从所请，姑备以兵，土尔扈特闻知，徒生疑惧，或致酿成大事，所关非细，无论虚实，应先示之诚信，以

---

① 《署定边左副将军车布登札布等奏派人赴阿勒坦诺尔乌梁海等处打探土尔扈特返回消息折》，乾隆三十六年四月十三日，《清代东归和布克赛尔土尔扈特满文档案全译》，第 5 页。

② 《谕伊勒图等对来归者需妥善安置》，乾隆三十六年五月十四日，《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第 9–10 页。

③ 《谕伊勒图等对来归者需妥善安置》，乾隆三十六年五月十四日，《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第 10 页。

④ 《伊犁将军伊勒图等奏哈萨克汗阿布赉遣人告知土尔扈特行踪并请援兵讨伐等情折》，乾隆三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清代东归和布克赛尔土尔扈特满文档案全译》，第 7 页。

⑤ 松筠修，汪延楷、祁韵士撰：《西陲总统事略》，中国书店，2010 年，第 227 页。

⑥ 《伊犁将军伊勒图等奏哈萨克汗阿布赉遣人告知土尔扈特行踪并请援兵讨伐等情折》，乾隆三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清代东归和布克赛尔土尔扈特满文档案全译》，第 8 页。

昭怀徕，如此则土尔扈特虽有异志，亦可化现天良，保无意外之虞。”[①] 这实则表达了伊勒图怀疑东来之人的目的，从而采取保守策略，由此保证进退皆可。

哈萨克多罗特拜之子玛尔罕亦前来报称：“从俄罗斯逃出之厄鲁特舍楞，留其户口，率兵万人，向沙尔乌苏、阿克雅尔地方前来之时，掠夺哈萨克羊只二千。据说，阿睦尔撒纳与舍楞同在一处，阿布赉已领兵二万，前往迎战。”[②] 此报指出为首者是舍楞等人，伊勒图认为舍楞前因杀害唐喀禄而逃，表明并非真心归诚，奏请对其加以防范。对于所提及的阿睦尔撒纳，其人早已去世，清朝曾派人验看尸体，认为此系哈萨克假借其名来恫吓众人。但玛尔罕所递消息可与肯泽哈喇、布鲁特所告相互印证，更加确信东归属实。乾隆帝虽然称：“若舍楞向我等恳请归顺者属实，伊即便掠夺哈萨克，我等只当不知，我暗中防范，尚不需派兵援助哈萨克。”但却给纳旺、绰尔本等递信，令他们告知哈萨克：“今舍楞已夺尔等之羊，尔等亦理当报复，尽量掠夺舍楞，尔等掠夺舍楞后，一切俘获，我大国将军、大臣等，一点不取，俱赏尔等。”[③] 质言之，清朝默许哈萨克等攻掠舍楞，企图利用哈萨克来削弱舍楞的力量。

可见哈萨克使者传递的消息极大影响了清朝的决策，给出了准许他抢掠东归人众的对策，此举是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判断。其一，来自俄罗斯、哈萨克方面的消息，皆强调其中有曾背叛清朝之人，从而误导了清朝的判断。哈萨克使者布鲁特曾密告：“近日阿布赉所告之言，均系激怒将军大臣者也”。[④] 渥巴锡等人东归后，钦差大臣舒赫德亦奏：“观察阿布赉，人奸狡猾，伊担忧此厄鲁特前来，我将其收容后，对伊无益，即肆意造谣。并遣卜鲁特、肯泽哈拉等，声言求我遣兵，专系激我之意，此断不可相信。”[⑤] 由此可知，哈萨克等传递的消息中隐瞒实情较多，且更多地提及与东归部众的交战情况。其二，东归部众事先并未向清朝通信，且有抢劫俄罗斯、哈萨克等情，人众多达八九万户，而此时清朝在伊犁的驻防官兵不过万余人，倘若出现特殊情况，伊犁驻军力有不逮。对此，舒赫德曾奏：“现倘若此等厄鲁特诚心前来归顺大皇帝，则彼等务必事先差人。若不派人进入我地界肆意骚扰，则我等必调大军剿灭，断不轻易饶恕。”[⑥] 这表达了清朝对前来之人动机的不确定性。基于以上情由，清朝才默许哈萨克等的劫掠行为，客观上导致了东归部众的重大损失。

乾隆帝虽然对伊犁将军伊勒图等人的奏报给予肯定，但同时从大国君主的角度给出指导方针，在军机处寄给参赞大臣安泰令其晓谕哈萨克的谕旨中曾载：

> 我大圣皇帝，凡天下外藩之众，倘若诚心投降，皆同样施恩抚爱。譬如，尔等哈萨克，因恭顺归附之故，数年屡施重恩。今土尔扈特部众弃牧携眷，远涉前来者，特为承蒙大皇帝恩泽之意。尔等截击伊等者，则乃为非也。今若此等厄鲁特归顺我朝后，将尔等这般行为，尚且理当治罪于尔。现在此等厄鲁特，尚未抵达我界，且伊等又劫掠尔等畜群羊只，我等不究则已，岂有反遣兵丁征伐伊等之理乎？尔等阿布赉所求告之言，专为我大国派兵征讨土尔扈特后，尔等想从中渔利，此乃断然不可。[⑦]

上述谕旨反映了乾隆帝在确认东归属实的情况下，重新给出应对之策，转为谴责哈萨克的截击行为，并指出倘若这些人归顺清朝，那哈萨克的行为应当治罪。为了防止哈萨克用言语欺哄在

---

① 松筠修，汪廷楷、祁韵士撰：《西陲总统事略》，第 227 页。

② 《谕伊勒图等对舍楞等来归需相机行事》，乾隆三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第 11 页。

③ 《谕伊勒图等对舍楞等来归需相机行事》，乾隆三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第 11–12 页。

④ 《谕伊勒图等若土部来归属实需妥善安抚》，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初八日，《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第 14 页。

⑤ 《谕舒赫德其与伊昌阿、硕通料理土部来归之事有功特加恩赐》，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二十五日，《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第 49 页。

⑥ 《伊犁将军伊勒图等奏哈萨克汗阿布赉遣人告知土尔扈特行踪并请援兵讨伐等情折》，乾隆三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清代东归和布克赛尔土尔扈特满文档案全译》，第 8 页。

⑦ 《谕伊勒图等若土部来归属实需妥善安抚》，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初八日，《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第 14–15 页。

纳旺等人答应发兵截击的请求，专门给舒赫德以应对之策，重申赦免舍楞之罪，以此来招诱他们前来归顺。

乾隆帝如此决策与重新评估当时的形势有关，“土尔扈特之众，恳请来降者，尚且属实。何以言之，伊犁这一边陲之地，若为荒地，则土尔扈特之人，怀有占其旧牧场之念，难以预料，然今伊犁之地，已驻重兵，修筑城池，伊等明知有将军大臣驻守，岂有弃牧携眷前来者，此尚无甚可疑之处”。① 这是对之前伊勒图、舒赫德等人顾虑的回应，肯定这批人众东归属实。并判断：“朕意，伊等来投为九分，怀疑为一分耶。” ② 此举与之前默认哈萨克的截击行为实则并不冲突。在伊犁等处驻防有限条件下，面对如此大批人众前来，哈萨克的劫掠削弱了他们的力量，反而有利于清朝对他们的接纳安置。

此时哈萨克阿布赍已经臣服清朝，虽然抢掠东归人众，但又不得不揣测清朝的态度，在未得到清朝的态度之前，还不能随意下决定，特别是其与渥巴锡等人会面后，其态度随着发生转变。此在钦差大臣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奏报询问渥巴锡来归情形之折中有所反映：

> 阿布赍等意欲行抢，渥巴锡、舍楞率数人亲自去见阿布赍等告称，我等均系往投大圣皇帝之人，尔等亦已为大圣皇帝属众，将尔等皆封为汗、王、公、大员，我等均系大圣皇帝属众，尔等意欲如何，现即将我等缚往，我等在尔等游牧界内哉，去往何处耶。不然，准我等通过。言毕，阿布赍等虽（当作随——引者注）即率兵返回。③

此前哈萨克阿布赍抢掠土尔扈特等部，除了自身贪得利益外，还一定程度上履行俄罗斯令其截击的藩属义务，得知渥巴锡等是归顺清朝前来，害怕受到清朝的责难而不再攻掠，实际上是奉行平衡术的体现。而他部之哈萨克并非如此，仍继续攻击该部。不过，哈萨克阿布赍的撤兵，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东归部众的损失和前进的阻力。

伊犁参赞大臣巴图济尔噶勒认为这些投诚之人不可深信，奏请由喀尔喀等处选派二万兵备用，但乾隆帝却认为：

> 渥巴锡并未犯罪，舍楞前虽获罪，迹似可疑，但其属下能有几人？渥巴锡既已投诚，舍楞势孤同来，亦应有之事。若谓俄罗斯明知伊等投诚，佯为不知，或同商伪顺，断无是事，朕谓其投诚十分之九。……倘舍楞稍存异心，尔等乘机投间，令伊等离异。舍楞属人无多，尔等会同渥巴锡合兵办理，亦不费力。若渥巴锡、舍楞均无投诚之意，即须酌量整兵重惩。④

此表明乾隆帝认为这些人归顺是实，但亦给出了应对突变之策，选取官兵一万名作为防备。

乾隆三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策伯克多尔济率第一批人众到达察林河畔，声称是为归顺清朝而来，至此清朝最终证实了东归部落的动机，从而开始筹办接纳与安置事宜。并派人前往哈萨克传谕，令其停止攻掠，放行后续东归之人。与此同时，先发制人与俄罗斯交涉东归人众的归属问题。

可见，在接到俄罗斯使臣的报信后，署定边左副将军车布登札布曾派人前往俄罗斯所属乌梁海处探听消息，但最终所获消息价值不大。陆续从哈萨克脱回的厄鲁特人，以及哈萨克商贾等，给清朝传递消息表明这些人确实东来。特别是哈萨克阿布赍、阿布勒比斯、多罗特拜等人的报信，使清朝得到了相对准确的消息，对后面接纳和安置政策的制定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了进一步核实东归之事，清朝曾派纳旺、绰尔本等前去哈萨克阿布赍处探听消息，但在纳旺等抵

---

① 《谕伊勒图等若土部来归属实需妥善安抚》，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初八日，《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第 14 页。

② 《伊犁将军伊勒图等奏哈萨克汗阿布赍遣人告知土尔扈特行踪并请援兵讨伐等情折》，乾隆三十六年五月二十四日，《清代东归和布克赛尔土尔扈特满文档案全译》，第 8 页。

③ 《钦差大臣额驸色布腾巴勒珠尔奏土尔扈特谱系及来归原因和户口数目折》，乾隆三十六年八月初三日，《清代东归和布克赛尔土尔扈特满文档案全译》，第 39–40 页。

④ 《清高宗实录》卷 887，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丙戌。

达哈萨克之时，土尔扈特部首批人众已抵达察林河畔，所以最终探得的消息滞后且有误。①这说明清朝对于土尔扈特等部的东归事先未能知悉，再加上清朝获得的消息十分有限以及俄罗斯、哈萨克的有意误导，其间对于东归部众前来的目的有所猜忌，但是乾隆帝最终展示了其高瞻远瞩、大国胸襟，做出了比较正确的决策，可以说在土尔扈特等部的东归应对与接纳安置上，乾隆帝在其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三、留居额济勒部众东来之传言

土尔扈特等部自额济勒起程东归时，对岸万余户人因河水没有结冰而未能渡河。不过，在清朝安置东归人众之时，却从哈萨克使者的口中传出了这批留居之人欲归顺清朝之事。随后，清朝陆续获得的各类消息中亦有此说，为此，清朝一边派遣纳旺等人前往哈萨克打探消息，一边筹划这批人众的安置事宜。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据前往哈萨克越冬地方征收赋税之侍卫岱林报告，返回途中遇见哈萨克使者布鲁特对其言称："土尔扈特一支万余户又迁徙前来，现前至乌里噶克查木都地方，差派使者向阿布赉呈献一妻子、一马匹作为礼物。使者言称，之前我们土尔扈特渥巴锡、舍楞等征讨你们而出，并非确实征战你们，请在你们哈萨拉克巴彦额拉处越冬。"②哈萨克使者布鲁特抵达塔尔巴哈台后又告称："土尔扈特差派使者告称，我们兄长之子渥巴锡已经归附大主，我们也寻来归附。"③后经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伊勒图询问得知，布鲁特系哈萨克阿布勒比斯派来请安之人，此消息是从哈萨克阿布勒比斯所属哈萨克图伦都处听说，而哈萨克图伦都则得自于哈萨克阿布赉所差之人。可见其间此消息经过多次转述，其真实性已经值得怀疑，但似乎因为是阿布勒比斯遣派的使者所报，且转述得有模有样，所以参赞大臣伊勒图与将军舒赫德皆判断这些人来归的可能性较大。④为了获得进一步消息，特令哈萨克使者布鲁特返回核实后再行呈报，同时筹划派人前往哈萨克打探具体消息。

随后舒赫德从哈萨克卖出之厄鲁特都布珠尔处得知，俄罗斯曾向哈萨克阿布赉差派使者，令其拦截从额济勒脱逃之二万余户土尔扈特人，⑤这使清朝进一步确定了这批人众东来的真实性。考虑到他们滞留在哈萨克地方，虽然阿布赉、阿布勒比斯因他们归顺清朝而来并未大肆抢掠，但难保不会发生互相抢掠之事，故奏派领队大臣纳旺等人前往该处嘉奖传谕："尔等兄弟闻得土尔扈特等人归附大主，并未用兵，指地越冬，甚好，此方感激朕恩，久蒙恩泽之道。彼处我等大臣等奏报后，朕甚嘉奖尔等，现遣人赏赐尔等绸缎，尔等应好生照看，早日遣往伊犁地方。"⑥可见名为嘉奖，实为打探消息。乾隆帝特意吩咐纳旺等人，若获得确实消息则即刻前往迎接，

---

① 《伊犁将军伊勒图等奏纳旺等员前往哈萨克游牧探获土尔扈特消息等情折》，乾隆三十六年六月十三日，《清代东归和布克赛尔土尔扈特满文档案全译》，第 12 页。

②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伊勒图等奏留在额济勒之三万余户土尔扈特请求在哈萨克过冬折》，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三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编：《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104 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年，第 291 页。按，本文所用此汇编中档案由笔者译为汉文。

③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伊勒图等奏留在额济勒之三万余户土尔扈特请求在哈萨克过冬折》，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三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104 册，第 292 页。

④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伊勒图等奏留在额济勒地方土尔扈特人要求暂移到哈萨克阿布勒必（比）斯处折》，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十一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104 册，第 369−372 页；《伊犁将军舒赫德奏在额济勒之土尔扈特若来伊犁塔尔巴哈台均收留安置折》，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十八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104 册，第 429−430 页。

⑤ 《伊犁将军舒赫德等奏自哈萨克脱出厄鲁特称留在额济勒之二万余名土尔扈特于哈拉诺尔过冬折》，乾隆三十七年二月初十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105 册，第 163−164 页。

⑥ 《伊犁将军舒赫德等奏派那旺前往哈萨克阿布赉处打探额济勒地方土尔扈特是否出来之消息折》（附札付 1 件），乾隆三十七年二月十七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105 册，第 199 页。按，清代汉文文献中"那旺"与"纳旺"混用。

晓示大主之恩，令他们早日东返。

新疆边吏等皆判断留居额济勒之人来归的可能性较大，这导致乾隆帝未曾怀疑消息的真实性，反而指示舒赫德筹划即将来归之人的接纳安置事宜。为了制定合理安置方案，分别令舒赫德向渥巴锡询问、福隆安向喇嘛雅兰丕勒询问这批人众情形。据雅兰丕勒告称，留居之人有一万三四千户，其中有渥巴锡亲叔彦德克，策伯克多尔济之叔阿萨尔虎，及其弟玛锡，杜尔伯特台吉特恩德克乌巴什、秦德恩，恭格之亲叔特克，和硕特台吉札木章等重要头目。① 乾隆帝据此认为彦德克为大台吉应封郡王或贝勒，其他人则按属众多寡酌定品级，并指示按照渥巴锡之例，对彦德克、阿萨尔虎、玛锡等人进行间隔安置。② 不过，雅兰丕勒所报多有谬误，随后舒赫德从渥巴锡处得到了较为详细的情形，其中有土尔扈特渥巴锡之叔彦德克，彦德克子阿萨尔虎，渥巴锡侄子玛锡；和硕特恭格远亲札木章，班济瑚之叔特克；杜尔伯特特恩德克乌巴什、秦德恩，共有大台吉七人，属众一万八千余户。③

乾隆三十七年二月，舒赫德从哈萨克卖出的二名渥巴锡之人口中得知，自额济勒脱出二三万户土尔扈特前至哈萨克哈喇库勒地方，因被哈萨克大肆抢掠，故派使者向阿布赉呈献礼物以求通过。④ 继而，又从哈萨克卖出渥巴锡之人处询知，他们曾在哈萨克听说去年额济勒土尔扈特全部寻来，前至哈喇库勒地方越冬。⑤ 这些人被哈萨克头目抢掠留作仆人使用，对该处情形较为了解，从而使清朝更加确定留居之人寻来是实。舒赫德把此消息告知渥巴锡等人，他们纷纷表示欢悦，为此乾隆帝称："渥巴锡此异常欢喜者，特为其骨肉能团聚一处，又重获其村俗（属众）也，今如全不得相居一处，而远隔之，则使其满怀热望，突泼冷水，必然致使肆意生疑，反而于事无益，故仍迎合伊之欢乐之心办理为是。"⑥ 并指示："若系渥巴锡正式世仆村俗（属众），则无它言，理应拨归与伊，若于台吉之中，实有其亲叔或近亲，也无不可同居一起，如果一般远族，非亲骨肉，则又不须固执聚居一处，另外居住均可。策伯克多尔济之村俗（属众），和硕特之台吉等，亦均应如此料理。"⑦ 改变了之前分隔安置的方案，欲将他们归并到原来的部落或亲属之中去。

领队大臣纳旺等人抵达哈萨克询问阿布勒比斯此事，阿布勒比斯言称："闻得去年额济勒存留土尔扈特脱出，于哈喇淖尔地方越冬，迄今再无消息前来。"⑧ 因此纳旺等人并未得到进一步消息，故又前往哈萨克阿布赉处打探。而在哈萨克使者布鲁特返回后，向阿布勒比斯提及留居之人脱出之事，阿布勒比斯称："去年八、九月间，系往来哈萨克如此任意胡说，迄今并未闻得确实消息，我想此系谣言。假若确实，俄罗斯察罕汗必定会致书于我，之前脱出土尔扈特一事，

---

① 《福隆安奏询问雅兰丕勒留居额济勒未归之土部情况折》，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二十七日，《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第 185 页。

② 《谕舒赫德等对土部属众盗马者须严惩并晓谕对又将归来之土部安置计划》，乾隆三十七年正月二十七日，《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第 187 页。

③ 《伊犁将军舒赫德等奏报留额济勒之土尔扈特台吉奴仆数目折》（附清单 1 件），乾隆三十七年二月二十九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105 册，第 295–296 页。

④ 《伊犁将军舒赫德等奏留在额济勒之土尔扈特派人前往哈萨克汗阿布赉处欲经彼处来归折》，乾隆三十七年三月初一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105 册，第 326–327 页。

⑤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伊勒图等奏据闻留额济勒之土尔扈特去年迁到哈拉库勒地方越冬折》，乾隆三十七年三月初八，《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105 册，第 374 页。按，"hara kul"有"哈拉库勒"与"哈喇库勒"两种汉译，本文行文采用"哈喇库勒"。

⑥ 《谕舒赫德等对又将归来之三万余土部安置事宜》，乾隆三十七年三月二十日，《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第 202–203 页。按，此处将"albatu"译为"村俗"不妥，应译为"属众"。

⑦ 《谕舒赫德等对又将归来之三万余土部安置事宜》，乾隆三十七年三月二十日，《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第 203 页。

⑧ 《伊犁将军舒赫德等奏那旺报传闻留在额济勒之土尔扈特去年在哈喇库勒过冬折》（附呈文 2 件），乾隆三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106 册，第 49 页。

俄罗斯察罕汗曾致书于我，令我截击土尔扈特等，并将擒获之大头人解送与他。现若此事确实，亦必定会致书于我。”① 可见阿布勒比斯对这批人东归之事并不知晓，认为这是哈萨克的谣言，此种回复实际上是对之前留居额济勒土尔扈特前至阿布勒比斯地方的种种传言加以否定。同年八月，舒赫德奏报并未获得额济勒土尔扈特东来的消息，② 至此清朝确定此消息为假，可能是哈萨克等人的谣言。

而俄罗斯方面亦收到此类传言，据俄人帕里莫夫曾称，维杰列夫向别克托夫报告杜尔伯特乌芦斯打算脱出，而且吉尔吉斯人的消息中亦称额济勒留居之人打算逃走，后自哈萨克返回俄罗斯的卡赞巴也夫报告，清朝派五十人组成的使团到阿布赉那里，希望准许留居俄国的土尔扈特人通过，俄罗斯为此将彦德克、阿萨尔虎、策伯乌巴锡等分别囚禁起来，杜绝此类事件发生。③ 乾隆四十年，从俄罗斯来投土尔扈特台吉敦多克车凌曾报告：“汗渥巴锡等寻往内附大主后，俄罗斯察罕汗差人于额济勒河边建立防护卡伦，余下土尔扈特等在额济勒河这边并无游牧地，全在额济勒河那边游牧。……俄罗斯又差人于我等伊斯塔尔皮里等处驻扎，监视土尔扈特等，看管驻扎月余，因未有行动迹象，方才返回。”④ 可见渥巴锡等东归后，俄罗斯已经加强防范，故也不可能再出现大规模脱出之人，因而留居额济勒部众东来的消息应为谣言无疑。

四、结语

自清朝获得俄罗斯报信厄鲁特人脱逃，直至土尔扈特等部抵达察林河畔，其间不过两月有余，加上中间传递消息所费时间，留给清朝统治者思考的时间很有限。面对这一突发情况，清朝内部也出现了不同声音，尤其是得知其中有叛逃清朝的舍楞等人，关于是否接纳东归之人的争论纷起。一部分大臣以这些人中有曾背叛清朝之人，而且前来目的不明，清朝与俄罗斯有不收纳逃人之约，因而反对接纳东归之人，但是乾隆帝力排众议，主张归顺则予以收纳，并针对大臣所虑给出解释和对策，这为接纳土尔扈特等部定下了基调。在哈萨克等方面报信中表达了这些人前来图谋不轨之意时，乾隆帝却给出了“投为九分，怀疑一分”的论断，因而乾隆帝在处理东归问题上尽显出统治者的智慧。何秋涛曾高度评价道：“高宗之处土尔扈特也，可谓仁如天智如神矣，始闻归顺之信，方嘉其携孥远来之意甚诚，即察其阽危求息之情甚惫，盖各大臣遵旨设汛侦探，于俄罗斯之兵追，哈萨克、布鲁特之劫掠，皆已洞悉其情状。”⑤

从处理土尔扈特等部东归消息可知，清朝事先对他们的东归并不知晓，从而不得不怀疑他们前来的目的。而俄罗斯的文书、哈萨克传递的消息中皆强调为首的是曾经叛逃清朝之人，意指他们前来的目的不纯，进一步误导了清朝的判断。这种怀疑贯穿了清朝对东归应对策略的始终，影响了东归之后安置和管理政策的实施。正是如此，使得这个话题被国内外史学研究者所聚焦，因立场不同而产生了各种认识。无论到底东归目的为何，但是他们抵达伊犁后诚心归顺清朝这个事实是不会改变的。最终他们用实际行动验证了乾隆帝所说的“终焉怀故土，遂尔弃

---

① 《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伊勒图等奏哈萨克王阿布勒必（比）斯告留在额济勒地方土尔扈特情形折》，乾隆三十七年三月二十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106 册，第 59 页。

② 《伊犁将军舒赫德奏额济勒地方之土尔扈特人无消息片》，乾隆三十七年八月初二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108 册，第 20 页。

③ H· 帕里莫夫：《卡尔梅克族在俄国境内时期的历史概况》，许淑明译，徐滨校，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 83–85 页。

④ 《伊犁将军伊勒图等奏报从俄罗斯来投土尔扈特台吉所供仍居额济勒河流域部众情形片》，乾隆四十年正月十八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 122 册，第 262 页。

⑤ 《土尔扈特归附始末》，何秋涛：《朔方备乘》卷 38，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编辑委员会编：《中国西北文献丛书》第 3 辑第 19 卷，兰州古籍书店，1990 年，第 147 页。

殊伦”① 的论调，他们这种对祖邦故土的地域认同和文化认同，保证了在他们东归后的百余年内的安定与和平，即使在清末新疆动乱期间，其对清朝国家的认可和向心力仍不曾减少，积极参与清朝对新疆的收复与治理。可以说，土尔扈特等部的东归极大巩固了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格局。

References

Ge Yugang. “Qianlongdi yu tuerhute menggu chongfan zuguo” (The Qianlong emperor and the return of the Torγod Mongols to the motherland). *Anhui shixue* (Historical Research in Auhui) 6 (1985).

Guo Wenzhong. “Tuerhute donggui zhong hasake xingxiang zai yanjiu: yi abulai han wei zhongxin” (A Study on the positive role of the Kazakh leader Abulai played during the return of the Turgut tribes to the East). *Qingshi yanjiu* (The Qing History Journal) 2 (2018).

Ma Dazheng. “Qingzhengfu dui mengguzu tuerhutebu de anzhi” (The Qing government’s settlement of the Mongolian Torγod tribes). In Zhongguo renmin daxue qingshi yanjiu suo, ed. *Qingshi yanjiu ji* (The Qing History Research Collection) Series 2. Beijing: Zhongguo renmin daxue chubanshe, 1982.

Mao Biyang. “Lüeshu tuerhutebu huigui” (A brief description of the return of the Torγod tribes). *Lishi dangan* (Historical Archives) 1 (1986).

Parimov, H. *Kaermeikezu zai eguo jingnei shiqi de lishi gaikuang* (Historical overview of the period of Kalmykia in Russia). Translated by Xu Shuming, proofread by Xu Bin. Wulumuqi: Xinjiang renmin chubanshe, 1986.

Wang Yuming. “Cong tuerhutebu de guilai kan geminzu de guanxi” (Relations among ethnic groups in the light of the return of the Torγod tribes). In Weng Dujian, ed. *Zhongguo minzu guanxishi yanjiu*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thnic Relations).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1984.

The Qing Dynasty’s Acquisition and Response to the Intelligence that the Torγods Who Returned to Their Homeland

ZHAO Yi (School of History, Xinjiang University; byzy2008@126.com)

Abstract: The Qing court had no prior knowledge of the situation when it obtained the intelligence from Russian authorities that the Ögeled, who had surrendered to Russians when the Qing army defeated the Junggar, had escaped, and they probably went to the old nomadic land of Oyirad. Later, it was known that some of them, such as Šeleng had defected to the Qing Dynasty. This unexpected situation triggered debate within the Qing court over whether to accept the Torγods. The Qing Dynasty decision to respond was based on the judgment of why the Torγods had returned and on their intentions. The debate had to be resolved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diverse sources of intelligence. This article begins from an examination of the Qing court’s channels for obtaining intelligence about the return of the Torγods, analyzes the various kinds of intelligence and the timely implementation of a reasonable coping strategy, elucidates the vital role that Emperor Qianlong played, and investigates the beginning and end of the rumor that the people who stayed in Ejil River returned to the homeland

Keywords: Torγods, return to the homeland, acquisition, approaches, response

① 《御制伊犁将军奏土尔扈特汗渥巴锡率全部归顺诗以志事》，钟兴麒等校注：《西域图志校注》，第 497 页。